

作 家
研 究

歌 德 新 論

L. Auerbach 作

方 士 人 譯

(一個偉大的英才和一個偏狹的俗物)

一八二八年，莫斯科的文學雜誌『Moskovsky Vestnik』發表歌德給萬內維丁斯基 (Venevitsinsky) 文學團體的一封信，討論將浮士德殘篇譯成俄文的事情。歌德對文藝界同人建議說：

「請繼續這樣按部就班地，傳授給你們的國民，那些對於他們有切身利益的事情。要時常把君王及其智慧與仁慈的意旨擺在心裏，去完成那些分配給你們的工

作。忠厚的人能夠做的事情，是有用的事情；心地坦白的人能夠理會的事情，是將要開花結實的事情。願你們鼓舞歡欣的酬報，常得你們自己內心的贊許，和你們皇上的恩准配合起來。』

緊跟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暴動後面走了過來的，這位偉大的詩人所給與的這樣一篇說教，沙皇尼古拉的憲兵們覺得很滿意了。歌德寫這封信並不是偶然的。這封信，事實上，包含着歌德投降了當時日耳曼布爾喬歷史上的懦弱，他所獲得的那許多所謂「智慧」。

我們將怎樣來處理歌德呢——已經將那從人類意識上拔掉資本主義的根這事情規定做我們的工作了的我們，作為普羅列塔利亞世界革命突擊隊的我們？

歌德是布爾喬在歷史上佔優勢時期的詩才。他是偉大的，做那作為封建制度時代以及地主和貴族文化的對立物而出現的新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的代言人；作為藝術家和思想家，他暴露了在發生期的布爾喬個人主義的許多矛盾，他

用力剝去歷史加給「浮士德」活動力的限制，他無意地洩露了所謂擁護那些曾被先行制度壓迫過的一切大眾利益的那布爾喬代議制的暫時性。

歌德本是日耳曼社會條件的一個產物，却已變成全世界資本主義一個有力的代言者了。在布爾喬的思想史裏他是能和黑格爾並列的。可是，在反映並表現他那階級的興起中，他却降落得很低了。法蘭西的布爾喬，經過幾年的大革命，經過「特爾米多」Thermidor 法國大革命中拿破侖政變二月，經過拿破侖戰爭時期，早已握得政權了。日耳曼的布爾喬却還軟弱得很——它妥協，它磋商條件，它爭論價錢；閃避着，調遣着，畏縮着，哭訴着，它像蠕行動物樣慢慢爬上了歷史的決鬥場。

歌德並不像梅林格所要斷言，是屬於統治階級的一羣。一個魏馬州的參贊，一個熱心的朝臣，一個毫無意義的小公國裏小統治者的僕人——歌德在歷史上表演着他所出身的階級布爾喬的戰術；他變成布爾喬在政治上無能的犧牲品了；它的懦弱和落後，與法蘭西布爾喬前進的實踐，正是一個對照。

給萬內維丁斯團體的信，是一位八十餘歲的老翁寫的。他曾親眼見過教育學家在法蘭西的活動，他曾領導過日耳曼的狂飆運動時期；終於逃出了魏馬，寄寓了十年之後，從意大利歸來的途中，他曾親自正面和法蘭西大革命相遇；他曾逐步留心過法蘭西階級爭鬥的發展；他看見拿破崙破命崛起，後來拿破崙雖然死滅了，而他自身依然健在；他生時得見一八三〇年法蘭西的新革命；已經是一位成名作家的他，目擊着席勒和攏命文學上的發展，而在生時又得見他們的埋葬；他是荷爾德（Hoelder）的朋友，他和黑格爾通信，他研究康德，康德是他同時代的人，還有費特，Fichte （維科比） Jacobi 及塞林 Schelling 也是；他研究好幾樣自然科學，具有百科全書上的知識；他將他對於色彩的研究，評價得比較他在文學上的作品更要高貴，而且他又的確是一位卓越的自哲學家。假古典主義，傷感主義，悲觀主義（Weltschmerz），新浪漫主義，海涅——這些都是他生平親眼看見過的。

在他那一百四十三卷的全集裏可以看出無數矛盾，那不但說明了他那一貫精神

的展開，而且更說明了他那不斷地變化着的觀點，以及在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保守的世界裏他那面有喜色的生存。

論歌德而要想用一個近乎正確的「引證」法，他不但是萬難允許——因為這實在是事實——而且也總是非常明顯地荒謬。

且讓同時代布爾喬形形色色的政黨去盛裝歌德吧——時而化裝成一個反動派，時而化裝成一個中庸的自由主義者，時而化裝成一個四海一家的人道主義者，時而化裝成一個狂妄的侵略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時而化裝成一個國際聯盟的意特沃羅基先鋒，時而化裝成一個君主主義者和守舊派，時而化裝成一個直覺的觀念論者，時而化裝成一個經驗論的實用主義者，時而化裝成一個達爾文主義的先見者，又時而化裝成進化論的一個最險惡的敵對者——只有我們才不要把歌德化而為一個辯證法的唯物論者。關於歌德的生活，關於歌德的創造，關於歌德精神的勞作，列寧主義給我們以了解並說明那邏輯和本質的可能性。從他的作品或書簡中斷章取義地摘

錄一點出來必不能代替一個完整而適當的估價——一段引用文既不能當做一篇分析的標準，也不能當做解說，它雖證實了證據，却不能消除證據自身的貧乏。布爾喬新聞紙以引用文接近歌德——我們倒可以送他們許多引用文；然而，他們却不能和歌德全部遺產相抗衡：和正在興起的布爾喬的古典相抗衡的工作，瀕死的布爾喬已不能夠勝任了。理解歌德是要理解布爾喬的種種特性，更要進而和它戰鬥。

『歌德在其作品中向當時日耳曼社會採取了一個兩重的姿態。他仇視它；他憎惡它而且要努力逃避它，如在 *Iphigenie* 中，又大半當他在意大利旅行期中；他反抗它，如他所創造的 *Cotz, Prometheus*，以及浮士德，他將美非安妃 *Mephistopheles* 那辛辣的嘲笑加在它身上。在另一方面，我們覺得他對它和解，同它親善——在他大部分的小詩中，以及在許多散文作品中，在 *Masque-rade* 中頌揚它，替它辯護，幫助它反對那正在起來反對它大那歷史運動，特別在那些論法蘭西大革命的著作中。所以，歌德有時偉的，有時渺小；有時是

嘲笑而且蔑視全宇宙的一個叛逆的天才，有時是一個小心的，馴良的，偏狹的俗物。歌德，雖然偉大，却無力克服日耳曼布爾喬的懦弱；相反的，布爾喬的懦弱倒征服了他，戰勝了這位偉大的日耳曼詩人，正是證明了通常不能「從內在」克服的這一事實的最好證據。歌德是全宇宙的，天性活動而愛塵世，不能從席勒向康德理想飛躍的懦弱中求解脫；他慧眼敏銳，不能看出這個飛躍畢竟只是用一個淺薄的懦弱去換一個誇張的而已。他的氣質，他的能力，他精神上的傾向，驅使他接近實際生活，而圍繞着他的那實際生活乃是一個悲慘的實際生活。這種矛盾——生存在一個他所應當痛恨的生活環境中，然而又被束縛在這個環境中，不得不把這個環境當做是他所能活動的唯一的環境——不變地擺在他面前，他的年齡越過越大，渺小的魏馬州參贊就退却了的這個偉大的詩人，就越變「可恥了。」

歌德這種顯著的特殊性被恩格斯在反對「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格林先生(H. E.

ri Gruer) 而寫的一篇辯論文裏指出來的。我們對於歌德作品要加以分析，必須以這種特殊性作為基準。我們有探索歌德矛盾發展的必要，對於在偉大的藝術家和其環境二者間的矛盾，在與貴族社會有因緣的布爾喬詩人及其階級之社會的實踐二者間的矛盾，我們有給以階級的估價的必要。

法蘭西大革命被歌德很猛烈地加以非難了。關於這一方面雄辯滔滔的陳述，我們不但在他私人通信中以及他和愛柯曼 Eckermann 談話中可以找到，而且也在他藝術的創造物中。他的『Great Cortaj』、『Citizen General』、『Insurgents』、『Chats of German Emigrants』，未完的悲劇『A Girl of Oberkirchen』都是『些渺小的，誹謗的，拙劣的，不能使人信服』，為反對布爾喬大革命而寫的小冊子。

然而，這種開聲，難道是從封建貴族的見地，憑『舊制度』的名義而出發的麼？這是和日耳曼布爾喬之間已構成了脫黨的破裂了嗎？或者乃是一種宣傳，主張『和平的』布爾喬進化，主張不用巴黎郊外的非常手段，雅各賓派和恐怖派，主張不

用暴烈的飛躍和突變的一種宣傳嗎？這個問題，在寫於一七九七年的 Hermann und Dorotea 這首詩中充分地解答了。自然，這首詩招致和平而曉喻革命的「混亂」「騷動」。自然，這首詩是主張「建設的企圖」而反對法蘭西「破壞的」手段的一篇辯答。然而這首詩含有貴族的，封建地主的，舊社會上層階級的，那渺小得非凡的，小布爾喬性的，庸俗的理想化麼？不，這首詩乃是對於小市民，對於豐衣足食的鄉村小業主，對於典型的公民們的習慣和生活樣式的一篇銷魂的頌詞。

對於法蘭西大革命的反感，差不多是全部日耳曼布爾喬所共有的。歌德的觀點，是和其階級的觀點一致的，甯可畏縮在小小公國的主之前，而不願學法蘭西的榜樣。布爾喬的吉倫特黨（Gironde 法國大革命中之資產階級政派）不是甯可和 emigrés（法國革命中亡命國外之王黨同盟，而不願和職工與工人，和郊外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同盟麼？已被布爾喬消解於反對舊制度的鬥爭中了的那暴力，布爾喬不是很駭怕的麼？

在歌德對於法蘭西大革命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並不是歌德所特有的一種二重性：那是空懷國家統一的熱望，卻沒有力量革命，而又要避免「平民」鬥爭的，日耳曼布爾喬的二重性。

這種二重性，日耳曼布爾喬之發展和情勢的特殊性，的確是那攪亂下層勞動階級生活的，任何民族革命運動中，任何布爾喬所奉為模範的姿態。

的確，即使由他同時代布爾喬的立場看起來，歌德和封建制度，是常常表現極度的妥協的。雖然在其他許多方面，他總是站在它最前綫的。例如，用恩格斯的話說，歌德對於『拿破侖掃除日耳曼污穢不堪的馬廐』竟袖手旁觀。歌德完全明白，拿破侖戰爭在歷史上的意義，將日耳曼州的數目從三百減少到三十九，又因而廢除了日耳曼許多地方的農民直接的隸屬。歌德被人責難，在所謂抵禦法蘭西的那自由戰爭時期，缺少敵愾心，並不是無因的。歌德毫無反對拿破侖戰爭的憤激——他不信日耳曼布爾喬能夠統一日耳曼而站在民族發展的前線，去進軍，雖然他曉得戰

勝拿破崙會發軔『人類史上一個新的紀元。』(註)

(註) 參看歌德所著「法蘭西戰役」。魏米 Walmsley 戰後，他說：「自今以往，世界史中將開始一個新的紀元，而且你們可以說我們已親眼看見過這新紀元的開端了。」

也許，歌德對拿破崙破命的態度，一部分是表示他對調解者，對鎮壓者，對強大武力的贊美，並表示他對新社會的騷擾，對那和武力相伴而生的新的激烈的變革，對新的歷史上的突變的認識。

因為那時歌德已經日見老大了，我們可以回想他曾經對愛柯曼說過的話：『目下動不動就談起什麼貴族主義，什麼民主主義，談得很起勁；可是這整個問題却非常簡單：我們在少年時期，我們不是沒有財產，便是不能辨別它們的價值，我們自然都是民主主義者；然而，如果經過一個長的歲月，我們既聚斂起一些財產，我們就不但想要把它擁為我們自己所有，而且更想要把它傳為那些將繼承我們財產的子孫，子孫的子孫，萬世所有。這便是，不管我們年輕時抱的什麼觀點，一到老

年，我們就都轉變為貴族主義者的理由。」

歌德在「威廉·邁斯特」一書中詠嘆着的是一種什麼生活呀？『建築在虔誠上面的一種家庭生活，被勤勉與秩序激厲着支持着——既不過於獨佔也不過於寬大，而又非常順利地和才幹與權力相適應的一種虔誠……在這裏，在我的面前，我看出了——慾望的範圍與為將來的工作，慎重與約束，天真與活動。』

這並不能就當做是歌德關心他那時代的懦弱，這毋寧說是證明了懦弱的勝利是多麼偉大。在這裏，我們看出了從 Prometheus 到 Pandora，從 Goetz Von Berlichingen 到 Egmont，從「維特」到 Affinities，以及從 Parafaußt 到「浮士德」最後的轉變第二部的收場，歌德發展過程中的成果。

然而，關於既不過於獨佔也不過於寬大的虔誠，關於慎重和約束的這一種說教——對於庸俗的節慾和布爾喬的聖潔這一種要求，關於溫和與中庸之道的這一種辯護，怎麼好和叛徒維持的普通觀念，以及浮士德那永遠被攪亂了的靈魂，相符合

呢？難道，一方面，在 Prometheus 反對上帝以及維特反對現實的那偉大抗議的叛逆中，又另一方面，在「威廉·邁斯特」一書中對於樂天知命的要求，在「Torquato Tasso」一書中對於約束和限制的要求，在「浮士德」一書中對於單調的實際活動的要求——這前後兩方面，真對立得很尖銳嗎？

『少年維特之煩惱』在全部世界文學史中差不多是最被人稱道的作品，拿破崙在埃及戰役中，身邊帶着「維特」，而且將它讀過七遍。他遇見歌德時，對於這作品，能夠提出具體的批評。

『被人誤解，乃是我們這類人的命運呵，』這是維特的哀訴。「維特」所以獲得了這麼一個大的成功，正因為他被叛逆的城市公民所了解，因為那是為發生的布爾喬社會中的「活人」而鬥爭，「因為在對於自然，對於內心和情緒的贊美之形式中，讀者很清楚地看出了反對社會現實的一個抗議」；因為「維特」是英雄內在靈性的理想化，這個英雄在文學裏是新的，而且和舊的型很尖銳地對立着。

主張「極端的個人主義」——便是「維特」一書的基調，「維特」和盼望着傲慢的個性，盼望着特立獨行的態度及不屈不撓的意志的，那狂飈時代的精神，完全一致。

和法蘭西對比着的，日耳曼布爾喬的軟弱，它的落後，以及它那狹隘的觀點，這便剖白了在「維特」一書中爲什麼蒙蔽着對社會批判的抗議之聲，在「維特」一書中突擊的暴力爲什麼不瞄準着妨礙布爾喬個人主義者的構成的那社會制度，却瞄準着世界一般，瞄準着整個的人類，瞄準着這樣的全宇宙。萊辛（Lessing）公言反對維特，反對他的自殺，並不是無謂的：爲了失戀，你就要把自己一槍打死。在現實的鬥爭中，你這個人還有什麼用處呢？假定綠蒂接受了維特的愛情，或者假定維特已找着了另外一個情人的安慰；末那，塵世的煩擾便告了一個結束了——這可當做這篇作品的推論，在這篇作品中，一個人的失戀特殊地作了情節的中心，作了行動的輪轂。

叛亂和志趣越來得抽象，向環境的叛變就越來得朦朧——雖然是嚴肅的——又——它的否定越來得廣大無邊，一遇到實際鬥爭，一和實際生活接觸，所有華飾的羽毛就脫落得乾乾淨淨，他投降也就越來得自然了。

「維特」中的主人翁曾這樣獨白過：『在這世界中，「非此——則彼」底選擇，是很難的。感情和行爲，可以投出種種虛影，如像鷹鼻與凹鼻之不同。我把你全部議論承認之後，又想在「非此——則彼」之間逃去，你別要怪我。』（照郭譯——譯者）所以接着發展下去，非常之清楚，如果維特還活着，他會轉變的——完全和歌德後來的哲學相適應——從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成一個貴族主義者；換一句話說，從一個超個人主義者轉變成了一個俗物，苟安於太平世界，吃着一片有保障的奶油麵包，擁有鄉村中的一間小屋，和歷史的進程隔絕。

（註）將這一點指出來，是很有趣味的，就是，Goetz Von Berlichingen 刊行本中，歌德將原稿中提到農民的壓迫和剝削的那一段，竟刪去了。

在維特的性格中，可以很準確地看出從摩西或穆罕默德到威廉·邁斯特的發展；摩西或穆罕默德的型曾攪擾過少年歌德的心靈；至於威廉·邁斯特，則在外科醫室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作為忠實、渺小、簡單、社會有效活動的狹隘而特殊的生活之象徵。

在布爾喬的德意志有名人物新近所簽署的歌德百年紀念宣言中，我們讀到：『歌德自身含有人性的一切矛盾，而由他那內在的天性中深切的二重性，他達到了解脫的和諧。』

人性的一切矛盾！不，歌德的偉大正在於他真實地證明了不能一眼看透人性的一切的矛盾——假定永久而不變的——却能看出正在資本家路綫上發展着的日耳曼人發生期的布爾喬個人主義的許多矛盾，一個特定的社會型的許多矛盾，還在胚胎階段中的許多矛盾，真實的和假想的、可解決的和（他們所）不可解決的許多矛盾，那許多矛盾，我們必須要把握住，已經開始從人類心靈中拔掉資本主義的根的我